

## 傳播學本體研究的問題與路徑\*

陳蕾\*\*

---

投稿日期：103 年 1 月 2 日；通過日期：103 年 9 月 18 日。

\* 作者在此一併致謝本刊諸位匿名評委及編委會在審閱反饋中給予的寶貴意見與建議。

\*\* 陳蕾為中國大陸福建師範大學傳播學院講師，email: jiangshulu@126.com。

本文引用格式：

陳蕾（2015）。〈傳播學本體研究的問題與路徑〉，《新聞學研究》，125: 217-258。

## 《摘要》

對傳播學知識命題進行追溯與反思的傳播學本體研究是關乎傳播學知識實踐以及傳播學者自我實現的重要性基礎命題。本文擬通過對傳播學本體命題的元反思重新探索傳播學本體宏大建構的問題、癥結與可能性出路，最終提出面向自我實現的傳播學本體研究綱領，以待來日有更多的學者參與討論，對這一綱領進行批評指正或補充擴展，共同完成具有共識性的傳播學本體宏大建構。

關鍵詞：元理論、本體、宏大建構、傳播學、綱領

## 壹、研究緣起

傳播學作為一門新學科，其誕生是對大眾傳播興起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社會情境需求的響應。上個世紀上半葉，在各種大眾傳播研究項目的支持與推動下，傳播學對公共政策、商業規劃、戰時宣傳與媒介經營管理產生了重要影響，繼而成功實現了自身的學科化建制，並開拓了學科早期的生存發展空間。然而，經過短暫的繁盛之後，隨著拉紮斯菲爾德（Paul Lazarsfeld）、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霍福蘭（Carl Hovland）、盧因（Kurt Lewin）等傳播學早期重要理論貢獻者的相繼離去以及傳播學學術創新力的銳減，傳播學的學科合理性與發展取向隨即也陷入了懸而未決的狀態。

從外部角度看，傳播學者的學術尊嚴正遭遇威脅。在很多傳統學科的學者眼中，傳播學是沒有什麼知識含金量的學術領地，是其他各路學科二流學者的匯聚地和避難所，以致很多傳播學者不願申明或承認自己的傳播學科背景。在很多知識管理者眼中，傳播學不過是可有可無的學術領地，上個世紀 90 年代美國的精簡大學運動中，與傳播相關的系所成為經常被拿來開刀的機構之一，一些院系由此被迫取消、縮減、改組和合併，研究經費也遭遇裁減，傳播學課程處於一種自衛狀態，而世界頂尖學府和常春藤聯盟的高校往往不設立專門的傳播學院系。

從內部角度看，由於傳播學在問題域、方法論、中心邏輯、歷史傳統和價值規範等基礎層面上充滿懸疑與爭議，傳播學者的學習與研究路徑，傳播學院系的學科定位與專業設置，傳播學教師的教材選擇與專業教學都相應地陷入了高度主觀和不確定的偶然性之中，從而消解了傳播學作為學術共同體的凝聚力，抑制了傳播學者內部以及與圈外學者之間

有創造力的對話與合作，也阻滯了傳播學知識的積累、深化與創新。

對傳播學所面臨困境與危機的審視與反思幾乎伴隨著傳播學成長的整個過程。1983 年，美國《傳播學季刊》為深入討論傳播學者的學術角色以及傳播學知識的社會效用問題，特別邀請那些在傳播領域有過重要學術貢獻的學者，以及在領導和管理傳播學學科上被寄予厚望的本領域領軍人物，就傳播學的當代研究狀況，傳播學研究者與科學、社會以及政策之間的關係，傳播學面向社會問題與社會結構的研究目標，以及相關研究策略等問題各抒己見。最後彙集了來自十多個國家四十一位傳播學者的三十五篇論文組成一期以「領域的發酵」為名的特刊，成為傳播學研究史上第一個也是最具影響力的傳播學本體反思高潮。然而，時隔多年後，當傳播學界再次回顧和反思這次「高潮」所帶來的實際後果時，卻令人驚訝地指出傳播學領域的「發酵」實際上無從談起，因為大家對「何謂發酵」、「如何發酵」始終沒有形成清晰的答案（Jensen, 2000），那期特刊作為一次學術事件固然被永久地銘記為傳播學研究史中的「重要里程碑」，然而學界對其中具體文章的印象似乎已慢慢褪色，現在看來那些文章大多為即興之思而非嚴謹之作，故鮮有人將其個別篇章列入「經典」（Sjovaag & Moe, 2009）。

此外，在傳播學本體研究領域富有盛名且行之甚遠的學者——美國傳播學家羅伯特·克雷格（Robert T. Craig），在其獲獎論文“Communication Theory as a Field”，發表十年之後的一篇自我回顧性文獻中亦不無悲觀地認為，他當年所主張的傳播學建構性元模式——「不同理論學派以傳播問題為中心進行辯證對話」固然在學界引起熱烈響應，但這種響應在實質層面的影響仍是十分有限的，傳播學理論至今依然處於「碎片化」的狀態中，建構性元模式實際上成為難以達至的學術理想，它猶如摩擦時閃現的電光石火，最終未能引起持續的燃燒

(Craig, 2009, pp. 7-12)。

由此我們可以引發這樣的疑問：為何在傳播學本體研究的議題上，最具影響力的學術討論，最盡心於系統化探索的學者都難以獲得實質性的突破，好似我們領域面臨的缺乏一貫性與碎片化的命運是理所當然且無從逃脫的呢？接下來，本文擬對傳播學本體研究的問題與困境進行反思，並試圖探索未來的研究路徑。

## 貳、傳播學本體研究的元反思

正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對於任何一種糾結性的困境，只有跳脫這個困境本身，從更高一階的抽象層面俯瞰全局，才可能理清癥結所在並最終走出困境。如果說傳播學本體研究是以傳播學為研究對象的反思性研究，那麼我們現在需要對之進行「二次反思」，這種「反思」的「反思」即「元反思」。<sup>1</sup> 具體而言，我們可圍繞以下三個維度展開對傳播學本體研究的元反思。

### 一、傳播學本體問題的研究意義與價值

基於問題哲學的視角，<sup>2</sup> 當某類研究陷入難以突破的困境時，需要反思的不僅僅是求索的方法或目標，還需要將反思指向問題本身：這是否是一個有研究價值的「真問題」？提出一個正確的問題往往比求解答案更重要。如果問題本身是無解的或無意義的，那麼強制的求解只會在錯誤的方向上越行越遠。因此，當我們進入元反思層面的時候，首先需要面對的質詢就是：傳播學本體問題是不是具有研究意義與價值的「真問題」？

本體之思作為一種形而上的無窮追問，最初旨在探索世界所存有一切的背後是否有一個抽象的現實世界的基礎，現代科學發展對物質世界的揭秘在很大程度上衝擊著形而上學，並以科學的解釋取代了古代種種樸素的本體論界說，而後現代主義對於「本質」和「中心」的批判亦在很大程度上解構著以本體論為基礎的經典哲學話語，但本體之思作為一種哲學思考的方式並沒有就此走向終結，不同的思想家和哲學家結合各時代語境對本體論命題進行重新釋義使之不斷煥發出新的生命光彩。本體論命題的經久不衰大約可歸於三點原因：

第一，溯本求源式的本體追問是人類一種本能的智力渴求，也是獲得平靜心靈與理性生活的必然路徑。即便關於本體論的探討充滿著複雜的糾結性，且隨著人類實踐和科學每一次劃時代的發現都將重新設立本體論議題，從而使之成為「沒有最後答案的答案」，但人類本性的理論思維總是渴求在最深刻的層次上和最徹底的意義上把握世界、解釋世界和確認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價值，這種終極性的智力渴求構成了貫穿古今的哲學本體論（孫正聿，1998）。

第二，對本體問題的終極關懷彰顯了人類在價值探索中堅韌的存在意志與永恆的精神光輝。在生存哲學的視角下，本體是構成一切事物的本質，是存在主體生命意志與精神力量的寄寓之所。只有充分意識到自我的「存在」，<sup>3</sup> 才能擺脫「異化」而擁有生活的本真狀態。而本體追問即通過對自我存在過程的追問把握自己真實的品格與特性，通過對與他人關係的追問反思存在的目標與方位，通過與「生存」彼岸（死亡）的溝通意識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第三，當代本體論研究中所包含的共識性要求使之具有了重要的實用意義。在當代本體觀下，本體問題的實質不在於追問與事實的相關性，而在於達至某種具有共識性的「本體論承諾」（謝維營，2009，頁

325)，即人們從自身需要和目的出發的一種思維假定，一種解釋的約定信念，並使之成為解決其他一切問題的邏輯前提、認識根據和價值目的。在「本體論承諾」所指向的「世界圖景」下，<sup>4</sup> 人類共同體的實踐理想才可能通過共同信念下的集體努力而得以實現。

由此看來，本體追問的認知旨趣在人類精神發展的長河與知識實踐的歷程中具有理性、價值與實用等層面的多重意義。回到傳播學的語境中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傳播學本體研究並不是一種定型而普遍的表述，但受到哲學視野下本體追問旨趣的激發，以傳播學的由來、本質、構成、知識規範、知識邏輯、知識潛能、知識價值與共識基礎為關切點的批判性研究與建構性研究事實存在著，這些研究是否取得突破關係著本領域學者學術智性的實現，知識價值的實現，乃至專業共同體與知識傳統的有效建構，其精神與實踐意義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對於傳播學本體研究領域所遭遇的困難和阻滯，我們不應畏難退縮，而應在這條值得探索的方向上繼續勇往直前。

## 二、傳播學本體研究的反身性質詢

如果關於傳播學理論碎片化的反思性探討本身也是碎片化的，如果關於傳播學理論缺乏規範的聲討本身也是缺乏規範意識的，如果關於傳播學價值缺失的批判本身也是價值指向模糊的，如果關於傳播學未能提出正確問題的指責本身也是缺乏終極問題關懷的，如果關於傳播學理論發展停滯的洞察本身也陷入了停滯，那麼這些關於傳播學知識本體的反思性話語將因未能實現自我反身性而最終消解於自己的批判之劍下。因此，關於傳播學本體研究的元反思必然包含對其反身性的審查和質詢。

誠如前文所述，在傳播學領域，「傳播學本體研究」並不是被充分

意識與制度化的專門性研究領域，我們即便把那些具有本體追問旨趣的研究歸於傳播學本體研究，但這些研究本身並不是在共識性的規範要求下完成的，而主要是基於個人的直覺體驗與感悟判斷，即便是以「集體反思」的形式呈現，也多見為多元、開放而缺乏深層關聯與對話的個體反思集合，而鮮見針對同一議題在同一旨趣下遵循同一規範的聚焦和深化。傳播學本體研究的終極價值和規範本身還是一個尚未證明的問題。

儘管自上個世紀 90 年代起，陸續有學者對傳播學反思性事業停滯不前、學術共同體彼此間難以進行創造性對話且缺乏對反思性事業實踐蘊含的意識而發出感歎，但具有建構意義的反思命題主要還是聚焦於對原來未加質疑的「概念」或「價值」的再反思，如「我們在進行學科化追求的同時是否應該對學科本身有所質疑？」（Craig, 2003; Nordenstreng, 2004; Peters, 1988; Shepherd, 1993; Sholle, 1995; Streeter, 1995）、「我們在進行合法化追求的同時是否應該對合法化本身有所質疑？」（Herbst, 2008, pp. 603-614）等，學界對傳播學本體研究的反身性省察和自我批判仍是十分罕見的。這對傳播學本體反思事業的發展而言無疑是一種瓶頸性制約。

因此，就當前時刻而言，把傳播學本體研究的反身性質詢與規範性建構提上議程是重要且迫切的。如果我們要重設「傳播學的想像力」，那麼我們如何率先重設「傳播學反思性話語的想像力」？如果我們要對「傳播學」進行有意義的規訓，那麼我們如何率先對「傳播學批判」進行有意義的規訓？要解答這些問題就需要回到本體追問的旨趣本身：由於本體追問面向深層思考的智力渴求本能，我們需要在深徹的反身中無窮追問；由於本體追問面向對生命意志與精神力量的召喚，我們需要在探索中融入對精神價值尺度的反思與重建；由於本體追問面向主體間約定與承諾的達成，我們需要在積極的對話與交鋒中逐漸沉澱共識。



### 三、傳播學本體研究的方法論反思

從對傳播學本體研究的反身性質詢中，我們可以看到傳播學反思性事業切實存在著深化與發展的困境，如果說原因不在於問題自身的「錯誤」或「虛假」，那麼原因還可能在於何處？於是，方法論便成為必然的反思範疇。

在此，我們有必要首先區分基於一般反思旨趣的本體研究與作為方法論的本體研究。嚴格意義上說，前文所指的傳播學本體研究是從認知旨趣方面加以界定的，即把對傳播學知識具有反思興趣的研究均歸入傳播學本體研究，但事實上，在哲學學科視角的理解範疇內，本體研究還具有重要的方法論蘊含，即作為「第一哲學」的奠基意義。從亞里斯多德（Aristotle）開始，包括笛卡爾（Rene Descartes）、斯賓諾莎（Benedictus Spinoza）、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休謨（David Hume）、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等在內幾乎所有近代的大哲學家，都在反思科學知識本體的興趣中試圖建立一種能作為一切科學知識基礎的哲學理論，即所謂的「第一哲學」。胡塞爾（Husserl, 1959／王炳文譯，2006）從現象學科學哲學的視角最系統完整地闡釋並發展了「第一哲學」的方法論蘊含。他認為，「第一哲學」是一種絕對證明自身正當的普遍的方法論，是一種關於一切可能認識之純粹的原理之總體。他把十九世紀歐洲科學普遍面臨的危機歸於「第一哲學」的危機，並以重建哲學的理性主義作為解決這場危機的根本出路。（Husserl, 1954／王炳文譯，2001）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哲學傳統內作為「第一哲學」的本體研究實際上代表著本體研究的完美形式與最高成就，它以對本體知識論的興趣為出發點，

以對本體方法論的闡明為落腳點，潛含對知識進行理性修正與宏大建構的意向動機。因此，基於一般反思旨趣的本體研究實際上代表著一種廣義的界定方式，而作為方法論的本體研究則代表一種狹義而嚴格的哲學界定方式。

傳播學門作為一個借助於回應社會熱點問題而完成自身建制的年輕學門，似乎很難擺脫與生俱來的切近具體實踐、注重解題效率的慣性致思路徑。在傳播學研究領域，傳播哲學一直處於非主流的冷門邊緣位置。雖然關於傳播學的知識反思伴隨著傳播學的一路成長，但缺乏傳播哲學視角的觀照，哲學本體論中的思想資源在很大程度上處於被遮蔽與隔絕的狀態，基於一般反思興趣的傳播學本體研究往往難以達及哲學方法論的研究層次，閃光的思想火花終將難以引起持續的燃燒。可以說，傳播哲學的危機狀態導致了傳播學本體研究的方法論危機，而傳播學本體研究的方法論危機導致了傳播學本體研究乃至整個傳播學學科知識建構的危機。要走出這一連環危機，需要回到傳播哲學的視角，針對本體追問的目標旨趣，充分發掘、借鑒與應用哲學研究傳統中關於本體方法論的智識資源。對應於傳播學本體研究在理性、價值與實用層面的意向目標，我們可以將以下三個問題作為切入點，尋找相關哲學知識脈絡並聚合方法論資源。

第一，既然溯本求源的本體追問是理性與智性追求的內在要求，那麼傳播學本體研究中無窮追問後的最深層本質隱藏於何處？對於這一問題，胡塞爾開闢的現象學科學哲學傳統<sup>5</sup>能給予豐富的洞見與啟發。在胡塞爾看來，真正的人類存在是哲學或理性的存在，因此對知識本體及其歷史目的進行反思的本質也就是對於人的自身理解和反思，即是對於作為人，作為歷史的存在而存在著的我們真正追求的東西所進行的自身理解，所進行的最深刻的反思。（Husserl, 1954／王炳文譯，2001，頁

90) 胡塞爾所轉向的超越論現象學實際上是一種在自我中回溯到一切知識根源的哲學努力，因為「自我是追溯到一切認識形成的最後源泉的動機，是認識者反思自身及其認識生活的動機，是被最終奠立的普遍哲學的動機。」(Husserl, 1954/王炳文譯，2001，頁 121) 這種超越論的哲學動機也是從笛卡爾開始的整個近代哲學的理論動機。「超越論哲學」一詞從康德以來經常被使用，是遵循康德哲學類型的普遍哲學的通用名稱，而超越論問題就是指世界怎樣在我們的意識生活中獲得意義和有效性的問題。(雷德鵬，2011，頁 173) 在超越論現象學的啟示下，傳播學本體研究中無窮追問的最深層次也應落歸於作為研究者的主體自身，從對研究主體自身意向與動機的反思中尋覓與重建知識本體的根源。

第二，既然主體是無窮追問後的最終關切與本質所在，那麼如何在傳播學本體問題的探索反思與理性重建中彰顯與加強主體的存在意志與精神價值？對於這一問題，哲學詮釋學的真理觀可給予豐富的洞見與啟發。詮釋學真理作為一種本體論真理，突破了傳統哲學中「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在一種主客體交互作用中來思考和界定真理，它把真理視為此在在自己的生存過程中呈現出來的創生的意義。與科學真理不同，詮釋學真理不是通過運用科學的認識論方法去把握客觀對象而達成，而是在此在的理解過程中通過此在的參與而逐漸生成並得到展示。(彭啟福，2005，頁 100) 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以解放主體為價值旨趣繼承與發展了詮釋學的真理觀，構設了重建主體理性生活，彰顯與加強主體存在意志和精神價值的批判詮釋學。他認為，主體的意志與潛能隱含於自我意識的觀念中，也就是說，主體在何種程度上意識到自身的形成史，便在何種程度上體會到自身的這種力量。(Horster, 1999/魯路譯，2010，頁 24) 而主體自我確定性的獲得，即本體論層

面的探索，它是通過對主體構成的解釋學分析來實現的。哈貝馬斯把自我反思作為本體探索的路徑，通過自我反思重新佔有構成性的認同傳統，並把作為他者的規範性期待轉化為自身的行為動機，從而在新環境中重新實現對自我的規劃，這相當於重建理性自身的統一基礎和自身的本體結構，使主體真正能夠理解自身、理解人類共同生活的意義和價值，並在本體論意義上體現自身的能動性和創造性，最終统一到自我構建與再生產的模型中，避免因自我誤解或自我迷失而導致的異化生活（張向東，2007，頁 31，52）。哈貝馬斯（Habermas, 1996／曹衛東譯，2002，頁 36）同時還從方法論層面構設了自我反思的路徑，即把主體存在的歷史結構和與他者共在的結構引入個體存在的本體構成中，因為僅憑個體自我不能實現自身的確定性，還必須通過與自己具有共通性的他我的反思和自我意識的反思才能實現自我的確定性。這些本體詮釋學的視角和觀點對傳播學本體研究具有深刻的方法論啟示。傳播學知識構成的本體詮釋應必然地包含對知識主體自我意識與意向目標的洞察，同時應在更廣闊的社會科學宏觀視野中完成知識主體自我認同與自我規劃的理性反思，進而將其滲入性回饋到知識本體的合理重構中，最終使主體自身的存在意志與精神價值得以彰顯與加強。

第三，既然知識本體研究具有成為「第一哲學」的奠基性潛能，那麼應如何使具有龐雜和多學科傳統的傳播學知識在本體研究議題上最大程度地整合群智、達成共識性的「本體論承諾」與「學科圖景」，進而為傳播學學科的知識重建奠基？對於這一問題，亞里斯多德首創的概貌性方法能給予豐富的洞見與啟發。概貌性方法是亞里斯多德最初提出的一種元理論方法。亞里斯多德把概貌性知識看作是一種尚未飽和的認識，常常以最初的定義、臨時性的分析或臨時性分析之後進行的規定等形態呈現自身，它如同一種在繪圖初始便被勾勒出來並且在之後的繪圖

過程中一直得到差異化補充的草圖，是對事物進行的尚未確定的描述，對圖像進行的著色和完善處理使這種描述得到超越，但草圖對繪圖而言所具備的意義是不可或缺的，因為我們需要先勾勒出基本線條，之後再詳細描繪圖像。倘若人們正確描出了基本線條，那每個人便應當各自且分別繼續接下去展開後續工作並對事物加以完善處理。（Haffe, 2008／沈國琴，勵潔丹譯，2011，頁 126-132）筆者認為，概貌性方法實質上是一種「分層共識」的解題策略，即對需要形成共識卻難以形成共識的複雜問題進行結構化分解，其中：基層議題是對問題域、問題走向及其價值規範的確認，類似於粗線條的大致勾勒；而衍生議題建立在基層議題獲得共識化的基礎上，對約定問題域中的子問題進行逐一探索與回答，以深化基礎共識的層次，類似於對圖像的著色和完善。共識的分層化梳理打破了僵化與單一的共識觀，該策略一方面有利於在學術共同體內引導形成「有序」的集體建構與「創造性」的學術對話，另一方面有利於形成動態開放的知識衍生體系，無論是基層議題、衍生議題，還是整個概貌結構，皆處在可深化、可拓延、可修補、可置換的可協調狀態，從而提升了知識對實踐與理性要求的彈性適應能力。概貌性方法對傳播學本體研究的方法論啟示在於，在傳播學本體觀難以一步達成的情況下，我們可以通過分層共識的結構設置聚焦討論，逐步沉澱本體共識。

### 參、傳播學本體觀的歷史整合與演化

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美國學者施拉姆順勢於當時社會對大眾傳播的普遍興趣與迫切的認知需要，以研究所為中心，以承接課題專案為契機，完成了傳播學的學科化建制，並確立了其應用型科學的性質與以大

眾傳播功能控制為主要旨趣目標的研究路徑。傳播學的這種學科定位理念及其早期積澱的經驗主義研究傳統後來被簡化歸結為 5W 模式的知識構架體系，繼而成為初始階段傳播學的知識本體基礎。

然而，施拉姆對傳播學的本體建基並不是一勞永逸的。除了知識理性自身所必然面臨的反思需求之外，還由於傳播學是一門典型的面向實踐、回饋實踐、依賴實踐的知識。它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實踐範式的形塑與規訓。而傳播技術的高速發展又不斷發掘出傳播實踐的新空間、新類型與新尺度，頻頻挑戰與衝擊既有傳播學知識的效用與邊界。於是，傳播學不得不經常回到對自身「知識本體」的反思中，<sup>6</sup> 通過整合新的思想資源，拓展傳播學的想像力，以應對不斷變化發展的實踐需要。大體觀之，傳播學本體觀在學科知識發展史中主要經過了三輪整合：

## 一、在經驗主義範疇內的整合

自上個世紀後半葉起，隨著社會交往的日益密切與媒介技術的突飛猛進，傳播速度與規模日益拓展，傳播實踐對傳播研究的迫切需求突破了原有的大眾傳播範疇，延伸到人際、組織、群體等各個層面。同時，原有以資助者利益為導向的傳播研究越來越受到理性與價值層面的批判與質詢，被認為「只是為外在資助者產生一個報告，而不是一篇付諸於傳播理論的學術整體的雜誌文章」（Rogers, 1990／殷曉蓉譯，2005，頁 424），故缺乏真正的理論建構性。這些對施拉姆開創的以應用為導向、以大眾傳播過程模式為思考框架的傳播學知識本體觀念構成了根本性的緊張。

為了解決上述危機，上世紀 80 年代，經查理斯·伯格和史蒂文·

查菲等學者的領導和推動，在學術界興起了一場旨將所有定量的、經驗主義的、行為科學的研究方法綜合起來的傳播科學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傳播科學被重新界定為：「傳播科學通過發展可以驗證的理論，來理解象徵與信號系統的生產、處理和效果，這些理論包含合乎自然規律的概括，能解釋與生產、處理和效果相關的現象。」（Baran, 2000／曹書樂譯，2004，頁 343）

這個定義涵蓋廣泛，它包括了人際的、組織的、大眾的、政治的、教育的或其他語境下的象徵與信號系統的生產、處理和效果，並有效地將原有大眾傳播范式傳統所忽略的積極的受眾理論、人際傳播研究以及對中長期綜合性傳播效果的關注吸納整合進來，使自身獲得了更精細的發展。但是，它同時也以一種僵硬的方法論標準，將大多數政治經濟學理論和文化研究理論等不符合其標準的研究排除出去，而並非真正像它自己所宣稱的那樣是相容並包的，事實上它還是忠於最初由保羅·拉紮斯菲爾德及其同時代學者提出的定義和研究框架。因此，傳播科學運動只能被視為知識在經驗主義範疇內的重新整合。雖然這種整合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傳播學過度囿於大眾傳播領域及學理性建構不足的問題，但經驗主義傳統作為諸多知識類型中的一種，無法為所有類型的傳播實踐訴求提供充分的理論與智力支援，亦無法在學理層面囊括一切方法論邏輯，這又從根本上限定了其解決問題的效度。當傳統經驗主義知識本體觀與新的傳播實踐及學理性要求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深化時，突破經驗主義的藩籬將成為必然的革命選擇。

## 二、多元研究傳統的表層整合

傳播科技不僅僅提高與擴展了既有社會運作的速度與規模，更帶來

了社會結構與社會關係的深刻變革。如果說傳播學早期的經驗主義傳統更主要地服務於社會強勢群體的主流價值，社會邊緣群體的非主流價值訴求處於被遮蔽或弱化的狀態，那麼到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隨著傳播科技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社會話語權由優勢群體壟斷的格局也受到了進一步衝擊。多元利益主體的意識覺醒還原並拓展了傳播實踐訴求在社會表達中的多元維度，傳播學在經驗主義傳統範疇內的整合已不足以充分支撐實踐發展與智識突破的需要。於是，原先在傳播學研究領域處於微弱之勢而難以立其足的另類學派與研究傳統開始從正面走上傳播學研究的舞臺，發出越來越大的聲音。其中，源於法蘭克福學的批判學派在傳播學領域的重新抬頭最為顯著。雖然早在四十年代傳播學起源之初，批判學派也差不多同期介入傳播研究議題，但它強烈的顛覆性影響是到了六十年代之後才開始逐步顯現的，自那時候起這種影響力便開始有增無減。

1983 年，美國主流學術刊物《傳播學期刊》以「領域的騷動」為主題發行了一期特刊。這期刊主要圍繞六名美國學者撰寫的傳播學論文進行探討，在期刊的前 52 頁，只有兩則評論涉及批判理論，但令人震驚的是該刊物在接下來 310 頁的評論性內容中有 86% 以上的篇幅是關於批判理論研究的論戰。（Miller, 2007, p. 75）對於傳播學領域內批判力量的增勢，學科傳統范式的奠基人施拉姆都不由感慨，「批判學派人數雖少，卻很有權威」。（Schramm & Porter, 1982／陳亮等譯，1984，頁 195）

後來，政治經濟學派、文化研究、女權主義、技術主義等其他學派思想亦紛紛介入，使原本處於經驗——批判二元對峙的傳播學陷入了更加複雜的多元割據之中。如果按照科學哲學家庫恩的提示，從教科書變化中觀察和回溯學科本體範式的演進和變革，我們便會發現，與早期將



傳播理論完全置於經驗主義研究傳統框架內的傳播學教科書不同，80年代後的傳播學教科書逐漸開始體現出多視野的特色，整合吸納了包括批判主義、詮釋主義在內的多種研究傳統，也就是說，這個時期學界對傳播學知識本體的認識已不再被單一的經驗主義研究傳統所壟斷，而是整合了多元研究傳統。不過，通過進一步觀察我們同時可以發現，這種整合確切而言僅僅屬於串聯性合併，即不同的研究傳統雜燴式地拼貼於傳播學的知識版圖中，以各自的理論話語邏輯從不同的維度分別闡釋對傳播問題某個斷面的見解，而不是圍繞一致的知識本體核心框架有機地融為一體，因此筆者將這種缺乏深層互動的整合稱之為「表層整合」。

應該說，多元研究傳統的整合為日益僵化和窄化的傳播學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在很大程度上拓寬了傳播學的知識本體域，豐富了學科知識的啟發來源的和想像空間，對緩解傳播學與實踐需要之間的緊張關係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然而表層整合的調適效果畢竟是有限的，它還帶來了新的問題：一方面，在多元整合的過程中，傳播學的方法和領域不斷擴張，吸納百川，與其他學科之間糾纏不清，變得越來越不純粹，從而不得不面臨著深刻的學科認同危機（陶鶴山，2002，頁 31-36）；另一方面，不同的研究傳統在不同的目的取向下各自為陣，甚至互相抗衡，致力於在維護自己立場的同時瓦解對立理論，最終不僅導致兩敗俱傷，也給學科帶來了分崩離析的危險，使傳播圖景分裂為互不連貫的許多碎塊，既阻礙了人們對傳播視界的完整認識，也阻礙了傳播學知識的積累和發展。

### 三、多元研究傳統的深層整合

當我們全面步入資訊社會之後，傳播深深嵌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

面，傳播學作為專業學門的價值與意義也深植入社會觀念與人類知識話語體系中。然而，傳播學門之於人類傳播實踐以及之於人類整體知識體系所作的實際貢獻卻遠遠不及日益加強的社會期待。傳播學在向多元研究傳統「全面開放」的過程中不斷積累加深的「集體性認知焦慮」與「學門危機」日益成為傳播學知識傳承、發展與創新的瓶頸。如何使傳播學在引入多向思想資源的同時而不失自我認同與創新動力，繼而提升傳播學對實踐世界與知識體系的實際貢獻，已然成為當下傳播學本體研究領域所迫切面臨的「公共難題」。對多元研究傳統的深層整合便是在這一時期專業共同體典型的致思路徑與努力方向。

多元研究傳統的深層整合是對前階段表層整合的延續和推進，也是對傳播學「泛化」與「分裂」問題的反思和克服。與表層整合相比，深層整合致力於在不同研究傳統和學派中尋找關聯，加強彼此間具有創造性的對話與合作，進而融合為能體現本學科特性的有機整體，而不僅只是多元研究傳統的簡單「並列共存」。如果把傳播學對多元研究傳統的吸納和表層整合比作接受外界「輸血」的過程，那麼傳播學對多元研究傳統的深層整合即自身「造血」機制的生髮。「輸血」的初衷在於拯救傳播學經驗主義核心範式對複雜實踐的解釋局限，而「造血」功能的培養生成是為了克服過分依賴外界而失去自主性的「輸血」後遺症。

1993 年，美國《傳播學季刊》在其特刊「領域的未來——在分裂與結合之間」中對傳播學內部不同研究傳統之間的相互孤立和分裂表示了深刻的憂慮，繼而提出了許多致力於消解無序紛爭，建立互動對話，實現不同研究傳統之間有機整合的「重建」思路：Craig（1993, pp. 26-33）認為應將傳播學理解為一種整合性的「實踐學科」，讓現有這些多樣性的、明顯矛盾的或不相關的傳播理論模式進行更多創造性的對話，使批判研究、闡釋研究、經驗研究功能的緊密結合；Rogers 與

Chaffee (1993, pp. 125-131) 指出研究視野的一致性是建立傳播學統一理論的前提條件，應該讓進入這一專業的學生看到一個廣泛的領域，而不是一個充滿鬥爭的學科分支；Rosengren (1993, pp. 6-17) 認為傳播學知識的深度整合一方面有賴於人文主義導向的傳播學研究者克服對形式模型的厭惡，另一方面有賴於社會科學導向的傳播學研究者對人文主義導向學者建設性洞見的吸收。

雖然上世紀九十年代這場著名的學術研討在傳播學知識本體演化進程中的實際影響遠未達及它理想性的聲稱，但它卻有效地開設出一系列富有價值的問題議程，在之後的傳播學學科反思與重建中，深度整合多元研究傳統的努力得到了廣泛的呼應和延續，沿此路徑行之較遠的學者及其主要觀點有：Craig (1999, pp. 119-161) 認為應把傳播學定位設計為一門具有特定研究方法、對象、邏輯的實踐性學科，並以建構主義元模式化解傳播學內部分裂與知識碎片化的困境，激發不同理論傳統間針對傳播問題進行創造性對話，進而重構傳播學知識體系；趙雅麗 (2011, 頁 3-24) 提出將傳播學建構為探索意義創造和分享機制的「意義科學」，並確立其形式學門的學科構想；Zhao Yuezhi (2010, pp. 573-583) 認為可按照重新定位傳播領域的歷史、重新確立傳播學在社會階梯中位置、重新定義社會變革、重新參與建構意義共同體以及重新發掘傳播學的烏托邦想像這五步模式對傳播學本體進行反思與重建等。與上述這些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體系化研究的成果相比，更多關於傳播學本體宏大建構與深度整合的設想還僅僅止於「思想火花」的迸發。

總體觀之，傳播學本體研究領域內新一輪整合與演化聚焦傳播學的身份與自主性危機，將建構學科獨特的核心邏輯、凝聚共同體力量、消除學科內在分裂、創造有意義的對話爭鳴、提高學科地位與影響力作為潛在的理論目標，以實現對多元研究傳統的深層整合與內化。然而，從

實際進程上看，雖然關於學科知識本體反思與重建的相關文獻日益增多，但論文成果多、專著成果少、初步設想多、體系化建構少。21 世紀以來新出版或再版的傳播學教科書也反映了學界當前主要還停留於多元研究傳統的表層整合階段，只不過和最初「以經驗主義傳統為主體，其他研究傳統相補充」的整合路徑相比，經驗主義以外的研究傳統在全書構成中的比重日益增加，多元研究傳統有了更均衡化的分配趨勢，且對「如何實現不同研究傳統之間的理性對話和良性互動」及「如何在紛繁複雜的多元理論傳統中體現傳播學的本質特徵」產生了越來越強的問題意識和回答意向。（LittleJohn, 2008／史安斌譯，2009）由此看來，傳播學領域內已達成普遍共識並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知識本體觀依然尚未產生，這一「公共謎題」的求解還有待於學界同仁的持續聚焦與共同努力。

#### 肆、概貌性解徑：面向自我實現的傳播學本體研究綱領

傳播學知識本體在新一輪深度整合中所面臨的境遇並不是傳播學所獨有的。隨著社會實踐的極度拓展與整合，包括社會學、經濟學、文藝學等傳統學科在內的專業知識領域，亦普遍面臨著原有知識分工不足以應對現當代複雜學科問題的境遇，加之後現代思潮的勃興強烈激蕩著傳統知識觀的固有陳規，各學科知識本體的內涵與範疇在各種衝擊下不斷拓寬與重建，對新思想新方法的有機整合與對學科本體的反思與重構成為突破各學門發展瓶頸的內在需要。

另一方面，哲學與社會科學語言學詮釋學轉向也將學科間溝通與融合的議題提上了學術界的議程。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知識日益學科互涉與邊界跨越就已被認定為這個時代的明確特徵。（Klein, 2003／

姜智芹譯，2005）隨著不同學科之間互補、交叉、交流的不斷增多，描述知識的隱喻已經從基礎與結構的靜態邏輯，轉向網路、電子系統、領域及拓撲的動態特徵。這些隱喻描述了構成成分之間的關係，比如關節點、結合處、限制、交叉、互相關聯、互相滲透、打破及斷裂等。

（Harvey, 1995, pp. 211-232）在新的隱喻觀下，知識邊界跨越所造成的互動與重組就像既往邊界的形成與維持一樣，也成為知識生產與知識構成的中心。正是基於這樣的背景，古本根重建社會科學委員會提出重建社會科學的宏大構想，以解放學科知識邊界僵化所壓制的知識生產力。這種意向和努力已越來越多地滲入到人類知識體系的反思與變革中去。新近的科學哲學研究結果亦顯示，社會科學體系繼上一輪深化專業分工之後，正面臨一場新的整合運動，我們越來越多地看到歐洲大陸哲學與大西洋哲學之間的相互滲透與融合，自然科學哲學與社會科學哲學之間的彼此借鑒與交融，常規科學的進展與一般哲學解釋之間的碰撞與分析。（郭貴春等，2009，頁 3）同時，現代知識體系下不同常規科學之間的界線也變得日益模糊，各學科的本體界限在有原則地放寬，認識論疆域在有限度地擴張，方法論形式在有效地相互滲透。（郭貴春，2010，頁 49）

在各具體學科與人類總體知識普遍面臨本體整合與重建的時代大流之下，傳播學的本體反思與重建具有獨特的開創性意義。這是由於傳播學及其它一系列跨學科、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綜合學科等「另類學科」的出現，本身即是對傳統知識分工困境的「彌補」與「治療」。雖然它們還不能完全脫離對舊知識體系的認同與依附，但在與多學科交融的知識越界探索中，因優先積累了大量問題與經驗而走在前沿，並最可能成為引領與帶動整體知識變革的先驅。

誠如伽達默爾所言，既定文本要成為解釋的對象，就意味著該文本

對解釋者提出了一個問題。所以，解釋經常包含與提給我們的問題的本質關聯。理解一個文本，就是理解這個問題。（Gadamer, 1960／洪漢鼎譯，1999，頁 375）傳播學最初的解釋者亦即學科創制人施拉姆一直以來懷揣心中並試圖解決的問題就是傳播學作為一門新知識之於整個社會科學知識體系的價值與貢獻，以及在此導向下的學科定位與定向問題。傳播學四大奠基人的相繼離開強化了他對這一問題的憂思。傳播學作為不同學科學者暫時彙聚而無法長期駐留的「十字路口」的比喻給傳播學的知識價值乃至學科合法性蒙上了一層厚重的陰霾。然而，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施拉姆來我國訪問交流時卻做了這樣的樂觀預測，他認為在未來一百年後，分門別類的社會科學如心理學、政治學、人類學等將面臨大規模綜合，綜合後的社會科學會非常看重對傳播的研究，傳播學將成為綜合之後新的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中的一個基本學科。（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世界新聞研究室，1983，頁 124）由此觀之，施拉姆顯然是洞察到哲學與社會科學在語言學詮釋學轉向背景下重建社會科學知識體系的契機，繼而從傳統固化疆界的知識想像的桎梏中掙脫出來，為傳播學開闢一種新的知識合法性來源，即在溝通與綜合不同傳統學科過程中的獨特價值與貢獻。他的大膽斷言為傳播學界預示了一種鼓舞人心的前景，但其實現必須建立在傳播學本體研究優先獲得突破的前提之上。那麼，應如何抓住時代與身份賦予的契機，推進傳播學本體研究的進路呢？

基於前文對傳播學本體研究的反身性質詢與方法論反思，本部分擬嘗試性地建構一個面向自我實現的傳播學本體研究綱領，作為概貌性解決當前傳播學本體研究缺乏共識性價值與規範問題的整體策略，期待來日有更多學者參與討論，對此權宜性構想做出批評指正或補充擴展，最終通過共識的凝聚與沉澱推進傳播學本體研究的根本性突破。

## 一、傳播學本體研究綱領的概貌結構

本文所指的研究綱領實際上是對概貌性方法的具體演繹與應用，它通過結構化定義的方式得以描述，是針對性解決某特定問題的總體策略，類似一種權宜的粗線條勾勒法。同時，它以「沉澱基礎共識，並在基礎共識指引下凝聚群體智慧以具體深入地解決指定問題，最終形成和發展深層共識」為意向目標。

在傳播學本體研究領域增設對作為概貌性方法的研究綱領的後設性討論，是解決「傳播學本體反思與重建缺乏創造性對話平臺，難以深度整合各種思想火花凝聚為基礎共識」這一問題的嘗試性方法策略，也是傳播學元理論研究的一次具體探索與實踐。<sup>7</sup>

那麼，應如何設置傳播學本體研究綱領的概貌結構呢？筆者以為，傳播學知識本體界定與詮釋的一個根本性困難在於傳播學知識構成的繁蕪性。在歷時的發展進路中，它還繼續向各門類學科知識開放，而在現有的專業分科教育體制下，要獲得有關傳播知識的全知性視角幾乎是不可能的，<sup>8</sup>這也是傳播學學術研究日益窄化和碎片化的根本原因。然而，就傳播學本體研究而言，如果我們放棄整體性的視野和觀照，從各自的局部角度展開斷面的研究，縱使可以獲得豐富的研究方法與路徑，但彼此之間因缺乏共同的邏輯規範和目標指向而難以展開創造性對話，大量碎片化的集合依然無法滿足本體問題的深層追問與終極關懷。如果我們堅持整體性的視野和觀照，那麼對於如此複雜且涉面廣的研究對象，我們又該如何超越方法論困境呢？對此，跨學科研究中「以問題為中心聚合群體智識」的思路對於解決複雜問題極具啟發意義。只是目前社會科學界主要是從制度層面闡釋「以問題為中心」的跨學科學術活動

所需條件和所面臨的限制（全國高校社會科學科研管理研究會組，2009，頁 65-72；汪丁丁、羅衛東、葉航，2004，頁 170-182），卻較少從元方法論的角度闡釋「以問題為中心的智識整合」是如何進行最初的設問並為後續研究預留空間的，而這恰恰是智識整合的演繹起點，其基礎性更優先於對跨學科研究的制度設計與對話邏輯的設計。

那麼，「以問題為中心聚合群體智識」的思路在元方法論層面應如何闡釋與應用呢？對此，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作進一步探討。首先要追問與審視「問題是如何被設置的」。任何一個問題的提出都不是理所當然的。設問者不同的視角旨趣和價值目標往往內在地規定著問題不同的定義方式與設置維度。如果未對此加以反思與澄明，或在問題定義與設置上存在根本性的差異，以問題為中心的智識整合便難以施行並獲得實質性進展。因此，智識整合的一個必要前提是在問題設問方式上獲得主體間共識。

不同的問題及其設問法在吸引智識合作上通常具有不同的效力。我們可以從理性認同度、情感認同度、合作意向認同度這三個維度評估任何一種問題設問方式所具備的共識潛力。其中，理性認同度表徵學界對問題及提問方式的科學性與學理性認同程度，如果問題本身被認定為是「偽問題」或「錯誤的問題」，便自然失去了深化與合作研究的必要；而情感認同度表徵學界對問題所導向價值目標的認同程度，如果其導向的價值目標是缺乏情感與價值感召力的，便自然失去了潛在合作者參與的興趣；至於合作意向認同度則表徵學界對設問者召喚合作之誠懇性與可能性的認同程度，如果設問者對合作規則與合作機制的論述是模糊不清的，且未充分預留與明晰後續研究空間，便自然失去了潛在合作者參與合作的意向。

在取得問題定義與設置的共識之後，我們還需要思考與設計「智識



是如何被整合的」。在知識本體宏大建構的問題上，每個研究者個體的視野和能力都顯現出難以超越與克服的局限性。然而，維基百科成功的運作模式讓我們看到了在知識碎片時代，宏大建構的可能性模式。即我們可以在自身視野和能力所及範圍內先權宜性地勾畫出宏大建構的整體圖景，在此框架下一方面盡可能地率先填充細部，另一方面開放性地標識出不完善與不完全之處，以待後續合作者在動態開放的文本中對權宜之處進行精煉與完善，對空缺之處進行填充與發展。

按照上述邏輯，傳播學本體研究綱領的概貌結構可從「設置問題」與「組織回答」兩個層面進行設置，其中前者包含對基層議題的探索與討論，而後者包含對衍生議題的探索與討論。這些思考實際上構成了筆者對傳播學本體宏觀研究方法論原則的一種初步設想，即理想的傳播學本體究應在澄清問題的理性維度與價值指向，並誠懇召喚主體間對話合作的前提下不斷整合群體智慧而最終實現宏大體系的動態建構。

## 二、傳播學本體研究綱領的基層議題

基層議題是傳播學本體研究綱領的核心，我們需要在這一層面錘煉出一種總體的設問方式與致思路徑，使其在理性認同、情感認同與合作可能上具有最高整合效力與最大共識潛能，從而率先實現傳播學本體研究在價值與規範層面的哲學反思與重建。

按照現象學科學哲學的邏輯，主體的意向旨趣是本體反思與追問的基點。通過對既往傳播學本體觀之視角旨趣與價值目標的還原，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聚焦方式與偏重維度，其中有的偏重對研究對象之人性價值實現的關切，有的偏重對理論之創造力與創新性及其對人類理智傳統貢獻程度的關切；有的偏重對理論與方法論之有效性和規範性的關切，

有的偏重對傳播學知識可辨識性、可操作性與可傳承性的關切，有的偏重對傳播學之獨立性與自主性價值實現的關切。這些基於不同視角旨趣的價值關切相互關聯交迭卻鮮有創造性的交流對話。對這些不同的意向，我們可進一步追問：哪種意向因具有更強的整合力而代表更深的反思層次？哪種意向因最能發掘自身潛能而最大彰顯主體存在的價值意義？哪種意向因契合更普遍的主體旨趣而最能凝聚最廣泛的共識？

從思辨層次上看，最後一種類型的價值取向似乎具有更高整合力：要實現傳播學之獨立性與自主性，就必須確保其做出獨特的知識貢獻，而知識貢獻的維度主要體現在對研究對象的人性關懷與對人類智識理論的獨特建構上，這一切的實現又需要以理論和方法論的有效性與規範性，以及知識的可辨識性、可操作性與可傳承性為保證。

然而，以學科獨立性與自主性作為傳播學本體建構的最高價值卻面臨著另外一種根本性的質疑，即：傳播學是真正意義上的學科嗎？如若不是，傳播學有必要以獨立自主的學科作為自身的發展目標嗎？對於持傳播學非學科論調的學者而言，傳播學的生命力正在於其「獨立性」與「自主性」的缺失，故對於學科基礎、共識、核心的探討和將傳播學知識體系化的努力要麼是無法實現的徒勞，要麼將成為傳播學展開知識想像力的束縛（Swanson, 1993）。而對於反對傳播學學科化的學者而言，建立在學科制度下的知識分工本身就是限制智力發展和異化學術生活的根本癥結，傳播學若以學科化為知識追求的目標，將遁入價值追求的悖論之中（Sholle, 1995）。在社會科學界對學科化分工開始全面反思的當代科學哲學語境下，非學科論者和反學科論者的論斷也顯得不無道理，可是面對傳播學內多元理論難以辨識與溝通的「巴比倫塔」之惑，他們亦無法給出有效的解決方案，傳播知識的建構和傳承又陷入了根本性的困難之中，傳播學本體建構於是成為一個無法規避卻又難達基礎共識的

問題。

傳播學的學科性之爭構成了傳播學本體研究價值規範難以歸一的根本癥結。困境之下，一種富有洞見的逆向反思方式正在學界醞釀，這種逆向性表現在把最根本的價值關懷指向從研究對象或研究事業轉向研究者自身，並以此作為反思知識價值的起點。潘忠黨（2008，頁 30-33）認為，內在的自我反思是比外在的制度反思更重要的議題，傳播學界目前還非常缺乏作為學者社區的「主體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覺的學術共同體，這容易導致不自覺地反芻別人的思想和盲目追隨話語權力的擁有者，即要麼在與現實無法關聯的「偽問題」上耗費時光，要麼伸手上（即政治權力科層體系的核心）或向業界的話語權力擁有者乞求問題，形成大量無用學術。只有通過自我反思形成「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才能獨立地抓住並提出現實中的「真問題」。<sup>9</sup> Jensen（1993, pp. 67-74）亦認為，我們對傳播學的價值反思主要是從學科版圖、學科合法性、方法一貫性、學科地位等針對傳播學知識的維度展開的，這種反思路徑失去了對知識實踐主體的觀照而難以深徹。這是因為知識的邊界和學科分類都是人為建構並維繫的，其本身不是我們旨趣所在，我們真正關切的是其實踐性後果：不同的邊界和分類將以不同的方式形塑著我們的生活，不僅影響我們所思所為，也影響到我們被他人理解的方式；而理論一貫性邏輯的實踐後果在於影響著知識的規訓與傳承，使共同體能按照定則進行學術研究，教授學業，設置課程，聘請老師，以及向知識管理者聲稱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因此，我們應該把學科反思問題從針對傳播學知識的質詢轉向針對我們自身的質詢，即：當我們從事傳播研究時，我們成為誰？如果我們的研究不僅僅是描述現實，還建構了現實，那麼我們應該進行什麼樣的建構？我們正在做的事情以及我們的認識論會產生什麼樣的實踐性後果？唯有如此，才能使傳播學的知識價值

在反思中得以更大程度的實現。

在逆向反思的視野下，有意義的知識本體建構應面向有意義的學術實踐，因此研究者在學術實踐中的自我反思成為一切反思的起點，研究者在學術實踐中自我價值的實現成為其他一切價值實現的前提。應該說，逆向反思是對「傳播學為何要追求學科自主性和獨立性」這一問題更深一層次的追問，也是對知識本體研究最高價值指向更本真的還原。在這種追問和還原下，我們之前所設的問題便有了新的答案：對傳播學者而言，在諸多令人珍視的知識價值之中，學術生涯的自我價值實現是最具有整合力的終極價值關懷。傳播學知識本體的宏大建構亦由此獲得了新的可能性契機，即既可直面非學科論者與反學科論者的質詢，又可重新整合不同價值偏向的本體觀並從中凝聚共識。這種方法論立場與胡塞爾回返人性，通過反思與重建共同體主體意向來合理重建科學知識的主張是一致的。我們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進一步證明逆向反思對傳播學本體建構的突破性意義。

第一，無論是學科論者，還是非學科論者，亦或是反學科論者，無論是面向人類社會實踐做貢獻的傳播學本體觀，還是面向人類理智知識體系做貢獻的傳播學本體觀，亦或面向獨立自主與可持續發展的傳播學本體觀，其最終指向都可歸於「為了更有意義的學術實踐」與「為了更高程度的自我實現」，這可成為不同傳播學本體觀論者的情感共識基礎，進而成為彼此之間展開創造性對話的邏輯基點。

第二，由於人總是在關係中實現自己的價值和達到人生的超越，而關係的形成與維繫又取決於生活世界中的交往互動，因此對自我實現的詮釋與理解必然是開放而豐富的。同時，自我實現的發展進路必然地要求主體不斷超越以缺失性動機為主導的狹隘的個人主義情結，逐步邁向以成長性動機為主導的普世價值追求。（彭運石，1999）這就意味著，

以自我實現為價值旨向的知識本體建構也應遵循上述包含於自我實現命題中的理性邏輯，把自身視為不斷超越「狹隘之善」而趨近於「普世之善」的與時俱進的動態建構過程。作為一種知識本體觀的理性共識，這種理路既有利於避免陷入僵化的知識本體格局與想像，又有利於在普世價值的召喚下形成更廣博的知識視野與更高遠的知識旨趣，從而為傳播學溝通與綜合不同學科知識，以及參與重建社會科學知識體系奠定必要根基。

第三，以自我實現為核心價值旨趣的知識本體觀將「傳播學是否為學科、能否為學科、應否為學科」，以及「如何理解傳播學知識邊界與知識結構」等充滿困擾與爭論，卻又缺乏裁斷標準的知識本體問題進行擱置與還原，然後在澄明研究者在學術實踐中主體意向的基礎上重設這些問題的提問原則與解題標準：關於知識本體的任何提問最終都應面向學術實踐的諸種可能，而關於知識本體的任何假定性理解與規劃都是為了更有意義地開展學術實踐並實現學者自身價值。因此，我們應從空洞思辨的知識本體論致思路徑轉向面對實踐與共識、意義與價值的本體論致思路徑。<sup>10</sup>

第四，若上述三點被充分澄明並獲得學界普遍認同，就意味著達成並確立了一種以研究者自我實現為價值旨趣的知識本體問題設問模式，未來的傳播學本體研究可以之為核心邏輯，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確立共同認可的衍生性議題並逐一探索回答。在具備理性和情感共識，且研究路徑與規則明確的前提之下，知識合作與共建得以可能，在創造性的碰撞與對話中，我們有望突破當前碎片化且彼此相互隔絕的本體研究困境，實現具有共識性的傳播學本體宏大建構。

第五，作為傳播學領域內的一次元理論探索與實踐，以自我實現為核心價值旨趣的知識本體觀為社會科學各學門普遍面臨的「知識本體之

惑」提供了一種可以參鑒的解答典範。此外，在知識分工過度瑣細和窄化，以至在很大程度上異化與偏離研究主體內在全面發展訴求的當代知識語境下，重申與發掘研究主體的「自我實現」意向實際上是對人類知識創造動力的本質直觀與人本回歸，它對反思與重構人類知識體系具有先鋒探索意義。

### 三、傳播學本體研究綱領的衍生議題

傳播學本體研究綱領的衍生議題是對被充分共識化的基層議題的分解與細化。在對傳播學本體研究基層議題的探討中，前文構設了一種面向自我實現的價值觀作為傳播學本體研究總體的設問方式與致思路徑，並對其合理性與價值意義進行闡釋論證。如果這種概貌性的「粗描」方式能得到學界同仁的普遍認同，就意味著在一個可以深化對話的知識平臺上約定與重設了傳播學本體研究的問題語境與解答意向，即以促成本學門研究者更高程度自我實現為內在動機與終極目標，為傳播學門確立一種自我界定、自我理解與自我規劃的方式，並以之作為傳播學元理論層的基礎性認知與方法論原則，滲透與應用到本學門的一切知識實踐中去。按照這一理路，本文進一步將面向研究主體自我實現的傳播學本體研究綱領細化分解為以下衍生議題：

第一，對學術語境下「自我實現」的預設性理解。自我實現理論的提出者馬斯洛認為，人有一種內在的或先天的趨於自我實現的成長傾向，它進一步表現為發揮自己潛能的願望與提高自我的衝動，這是類似於人性本能的普遍性需要（劉燁，2005）。雖然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最大程度發揮自己潛能並獲得高峰體驗式的自我實現感，但自我實現價值的人無疑是人類中最好的典範，自我實現是整個人類所要努力的方向。因

此，證明自我實現的前提與條件、過程與動力、困難與障礙，激發與幫助更多人真正認識自我，並按照自我本性的要求努力使自己成為自我實現者，成為人本主義心理學的中心任務，其視角觀點與人本主義及實用主義哲學的基本理念相互回應與強化，所帶來的啟示和影響已遠超出單純的心理學領域，超出單純的個人分析層面，對整個人類社會以及個人主體之外各類型主體的價值實現具有普遍的借鑒意義。對於以傳播學為志業，且亦存在著自我實現訴求和自我實現困擾的傳播學者而言，如何深入理解專業領域學術活動中自我實現的價值主體與價值使命，如何在重構主體價值取向的基礎上以積極明晰的主體意向去蔽當前所面臨的種種自我實現迷思與困擾，並從中探索和開闢在學術事業中自我實現的現實路徑，是我們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的衍生議題。

第二，對傳播學門核心範式與歷史生成邏輯的認知與理解。在以自我實現為價值旨趣的知識實踐中，對自我所寄身事業的歷史認知與理解是一切主體意向與行動的內在根源與依據。傳播學門作為一個既定的學術共同體，需要對自我起源結構、生成機制、發展脈絡形成共同的知識想像，才能在想像的共同體內建構可創造性對話的公共空間，凝聚智識合力，以更高的效率解決「公共謎題」，積累與發展專業共同體自我實現的智力資本。然而，自施拉姆奠基的傳播學範式遭遇質疑與挑戰之後，傳播學的歷史觀照與本體建構便陷入眾說紛紜、難獲共識的懸疑狀態。究其原因，很大程度在於學界缺乏對表徵知識體系的「元概念」缺乏意識與反思，用以解釋傳播學知識構成與演化機制的「範式」概念亦處在界定混亂、多元歧義的語用狀態中。因此，如何在辨識與澄清「範式」概念蘊含與語用規則的基礎上，重新厘定傳播學本體的範式結構與演化進路，亦成為有待我們进一步深化探討的衍生議題。

第三，對傳播學所處知識語境及其貢獻潛能的認知與判斷。在以自

我實現為價值旨趣的知識實踐中，對自我所處知識語境及對自我貢獻潛能的充分認知與準確判斷是實現最佳自我定位與自我規劃的必要前提。從生態位理論的隱喻性啟發中我們可以得知，任何既存生物基於自身的特殊結構、生理和行為，均具有自己獨特的生態位，進而決定了其生存空間、各自功能、營養位置，以及在環境變化梯度中所居的地位。只有找准屬於自己特定生態位的活動空間，才能維持自身存在並獲得發展。傳播學作為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中的一員，必然具有使自身獲得知識建制化的特殊資質，但同時也必然受到社會科學場域規則與知識合理性邏輯的形塑和影響。學科合法性往往成為學科在高校知識體系中立穩腳跟、爭取資源、持續發展的制度保障與依託，而不同社會思潮對知識合法性的詮釋又各不相同。因此，如何對社會科學場域的多重合法性邏輯進行詮釋，並從中探索傳播學獲得合法性資源的最佳「生態位」，亦成為有待我們進一步深化探討的衍生議題。

第四，對傳播學本體研究綱領的共識協調及傳播應用。由於傳播學本體研究綱領包含對表層及衍生議題的設定與回答，這一系列複雜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都可能面臨另類選擇的質詢和挑戰，每一層面共識的取得都可能經歷艱難的協調，因此，研究綱領層面「總體共識」的達成也必然需要較長時間的磨合與醞釀。如何在一個整體框架內催化與促成這一「總體共識」亦是有待我們進一步探討的衍生議題。就面向自我實現的傳播學本體研究綱領而言，其落腳點不止於形成共識化的知識觀念，還在於形成共識化的實踐原則，即把積極能動的主體觀念融入到具體的研究實踐、教學實踐，實務實踐以及學門的制度化建設中。這一目標的最終達成，還有賴於與當下知識實踐的深度互動對話，以及對實用性本體論研究的發掘與應用，即通過語義與語用層面的專門設計，將共識化的理念轉化為易於表達、傳遞、辨識與交流的符號表徵與規範說明，這



些同樣構成有待我們共同面對的有意義的衍生議題。

對於上述涉及的傳播學本體研究衍生議題，筆者前期曾做過一些初步的研究探索，部分成果以《試論範式概念在傳播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前景》、《傳播學核心範式的演化進路：一種新的學科史解讀視角》、《傳播學的身份定位與發展取向：在三種社會科學合法性邏輯的思想張力之間》為題，發表在《國際新聞界》與《新聞與傳播研究》等刊物上。在建構傳播學本體研究綱領的宏大議題下，這些初步探索僅僅是概貌性的「粗描」和「淺描」，需要通過「差異化」的補充修正與後期著色得以完善與確認。

## 伍、結語

蒂利希認為人具有三種存在性焦慮，對命運和死亡的焦慮，對空虛和無意義的焦慮，對內疚和有罪感的焦慮。擺脫焦慮之苦的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要把人生意義的焦慮變成敢於我行我素的勇氣。這有兩種辦法，一是在集體中肯定自己。二是像存在主義者那樣肯定自我，勇敢地擔負自己選擇成為自我的責任（Paul Tillich, 1990／成顯聰，王作虹譯，1998，頁 106）。對於傳播學者而言，在面對傳播學是否會消亡、傳播學是否為無意義之「學」、傳播學是否僅為特定利益集團服務而失去普世價值關懷等挑戰和質詢時，亦難以免除切己的「傳播學」存在性焦慮。對於緣於種種際遇而進入傳播學領域，擬以學術為業的學者而言，在面向自我實現的意向性目標引導下對傳播學本體進行反思和重構，賦予其積極意義與價值蘊含，這在當前「學科危機」的語境下是必要而迫切的。

作為傳播學的第一哲學，傳播學本體問題的生成和發展體現著專業

共同體對傳播學知識歷史、現狀和未來的理解與判斷，是一切學術活動的內在依據，同時也是傳播學其他一切知識得以依附和賴以發展的共同「家園」，它直接形塑著傳播學的存在方式，影響著傳播學的發展面向。對傳播學知識本體的宏大建構是一項系統而浩大的理論工程，需要學術共同體對知識實踐意向、研究規範、研究方法、研究綱領、綜合判斷，乃至最終的本體構型等一系列環節進行充分和開放的探討，並從中沉澱和積累共識。這一過程是個漫長的「發酵」過程。1983 年《傳播學季刊》關於「領域的發酵」的探索仍在路上。三十年後的今天，期盼謹以此文為持續「發酵」中的傳播學元理論研究凝聚力量，以共同開闢新方向，共同謀求新突破。

## 註釋

- 1 在此，「元反思」是筆者基於「元」（Meta-）在學術語境的語義應用中具有更高一層抽象的形而上蘊含而提出的一個概念命題，旨在對既有「反思性研究」進行更深入的價值規範與方法論探討。
- 2 借鑒伽達默爾對「問題意識」的詮釋學思考，真正的問題將開啟被問的東西的存在，使得文本進入了「效果歷史」的流程中，獲得創生的意義，而「虛假的問題」、「錯誤的問題」與「歪曲的問題」均無法導向開放性和有價值的探索，便難以獲得詮釋性的進展。（Gadamer, 1960／洪漢鼎譯，1999，頁 460-466）
- 3 海德格爾認為，對自我「存在」的意識可以通過追問我「具有」哪些內在的屬性（如技能、知識、資格等），以及我「佔有」哪些外在的東西（如財富，名譽，地位，權力等等）來實現。（Heidegger, 1967／陳嘉映、王慶節合譯，1999，頁 15）
- 4 歐陽康認為，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功能來看，本體論要作為一種哲學世界觀來向人們提供一個哲學意義上的世界圖景，以便為人們的理論活動和實踐活動提供必要的哲學信念，哲學原則和哲學方法。（歐陽康，2004，頁 10-15）
- 5 一般認為，西方科學哲學是圍繞「科學的合理性問題」的爭論而產生的，其主要存在三種傳統，第一種傳統即「邏輯主義」，是將科學的合理性問題歸結為

科學的邏輯和方法論的問題；而第二種傳統即「歷史主義」，則提倡不僅從科學理論的內在結構，而且更重要的是將科學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歷史現象，應該從價值、審美、宗教、心理等因素來探討科學的合理性問題；第三種傳統即此處涉及的「現象學傳統」，亦即現代人本主義科學哲學，這種傳統的顯著特點是對現代科學持尖銳的批判態度，著力於對科學的基礎和本質進行分析和批判，因而嘗試通過重建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來重建科學的合理性，胡塞爾是這一傳統的開創者。（雷德鵬，2011，頁 4-6）

- 6 這裏所指的知識本體沿用了哈貝馬斯本體即內在規定性的觀念。因此，對知識本體的反思，實際上就是指對知識結構形成與合理化過程的反思。（張向東，2007，頁 45）
- 7 元理論事業作為一項系統反思的事業，試圖超越非自覺的、零散的批評，以自覺的、系統化的理論建構為特定領域的知識實踐訂立規則。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元理論事業漸成勃興之勢，其研究視角廣泛滲入到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文藝學等具體學科中，取得了一定的研究進展。然而，由於元理論事業本身尚處於不成熟的發展起步階段，就目前而言其知識實踐產生的實際影響力還十分有限，亟待獲得進一步突破。而人類知識結構的整體轉型，亦有賴於各門具體學科元理論研究的逐一突破與相互聯盟。在此語境下，傳播學元理論的探索與實踐還具有超越本學門局部利益而對話整體知識界的宏大價值意義。
- 8 作為傳播學本體研究物件的傳播學是一個理論傳統十分龐雜多元的學術領地：它涵蓋了修辭學、社會心理學、社會文化學、批判學、現象學、符號學與控制論等七大理論傳統；它具有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人類學等多學科起源；它具有一百多種傳播定義方式和兩百多種細小理論，且隨著自身的演繹發展與傳播實踐的進一步豐富，這些資料還將持續上升。它具有內容差異十分顯著的多種教科書版本，在教育傳承上亦五花八門缺乏共識與規範。（Anderson, 1996; Craig, 1999, pp. 119-161; Dance, 1970, pp. 201-210; Dance & Larson, 1976）
- 9 筆者以為，潘忠黨的這種觀點極富洞見。但這裏對「偽問題」與「真問題」實際上還缺乏進一步的嚴格定義，筆者根據自己的理解對「真偽問題」的辨識做以下補充說明：在哈貝馬斯關於理論理性、實踐理性與審美理性的理論啟示下，筆者以為，關於「真偽」的真理判斷，在不同的關係範疇內具有不同的規範標準。在人與物的關係範疇內，真的標準在於是否存有的客觀真實性；在人與人的關係範疇內，真的標準在於是否合乎社會規範的價值正確性；在人與自己的關係範疇內，真的標準在於是否合乎自己價值意願的主觀真誠性。在所有關係範疇中，人與自己的關係範疇是最基礎，最本質的，是一切反思不可回溯的原點。潘忠黨在此所指的「真偽問題」應該是針對人與自己的關係範疇。在這一關係範疇內，出現「偽問題」的原因主要源於兩種可能，第一種是我們常

規理解的違背自己已形成的自主價值規範，但這不是我們在此討論語境中主要存在的問題，第二種即如潘忠黨所言，主體缺乏「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的主體性，也就是沒有形成自己作為學術社區成員所應有的核心價值意願，如此就無從判斷主觀真誠性的「真偽」，就必然淪入反芻別人思想和盲目追隨話語權力的境地。這樣基於「空無」價值感而提出或被給予的研究問題實際上均可歸於完全程度上的「偽問題」。

- 10 在此筆者把那些僅僅為了克服碎片化，即致力於把既存的被認為傳播學知識的知識以某種一貫性邏輯連接起來的知識本體論研究方式稱之為技術性的本體研究。這種研究方式的核心思路類似於發明某種「記憶法」，把看起來缺乏聯繫的諸多事物聯通起來，形成一個易識別的整體，但是由於「記憶法」是高度個性化的，這就意味著純粹以「技術化」方式解決傳播學本體問題是難以達成主體間共識的，因此單純以之作為知識本體研究方法是不充分的。

## 參考書目

- 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世界新聞研究室（1983）。《傳播學》。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
- 孔令華（2006）。〈試論傳播學研究的多元方法〉，《國際新聞界》，5: 12-16。
- 王炳文譯（2001）。《危機》。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 Husserl, E. [1954].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e Phänomenologie. Eine 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Leipzig, DEU: Meiner Felix Verlag.）
- 王炳文譯（2006）。《第一哲學》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 Husserl, E., & Boehm, R. (Eds.). [1956]. *Erste philosophie (1923/24): Erster teil kritische ideengeschichte*. The Hague, NLD: Springer Netherlands.）
- 王怡紅（2010）。〈論傳播學的關係價值研究：一個提升傳播學科品質的可能途徑〉，《傳播與社會學刊》，12: 87-92。
- 史安斌譯（2009）。《人類傳播理論（第九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原書 Littlejohn, S. W., & Foss, K. A. [2008]. *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Long Grove, IL: Waveland press.）
- 成顯聰、王作虹譯（1998）。《存在的勇氣》。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原書 Tillich, P. [1996]. *The courage to b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沈國琴、勵潔丹譯（2011）。《實踐哲學：亞里斯多德模式》。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原書 Höffe, O. [2009]. *Aristoteles: Die Hauptwerke: ein Lesebuch*. Tübingen, DEU: Gunter Narr Verlag.）

- 汪丁丁，羅衛東，葉航（2004）。〈跨學科的範式〉，《社會科學戰線》，6: 170-182。
- 林定夷（2006）。《問題與科學研究——問題學之探究》。中山：中山大學出版社。
- 邵培仁（1996）。〈論我國傳播學的發展趨勢〉，《新聞知識》，3: 8-10。
- 吳飛（2009）。〈傳播學研究的自主性反思〉，《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 121-128。
- 胡翼青（2004）。《傳播學：學科危機與範式革命》。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 姜智芹譯（2005）。《跨越邊界——知識 學科 學科互涉》。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 Klein, J. T. [1996]. *Crossing boundaries: Knowledge, disciplinarit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 洪漢鼎譯（1999）。《真理與方法》。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原書 Gadamer, H. G. [1990]. *Wahrheit und methode: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 broschiert*. Tübingen, DEU: Mohr Siebeck.）
- 曹衛東譯（2002）。《包容他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 Habermas, J. [1996]. *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 Studien zur politischen theorie*. Berlin, DEU: Suhrkamp Verlag.）
- 曹書樂譯（2004）。《大眾傳播理論：基礎、爭鳴與未來（第三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原書 Baran, S., & Davis, D. [2011].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Foundations, ferment, and future*. Boston, MA: Cengage Learning.）
- 陳亮等譯（1984）。《傳播學概論》。北京：新華出版社。（原書 Schramm, W. [1973]. *Men, messages, and media: A look at human communication*.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 陳嘉映、王慶節合譯（1999）。《存在與時間》。上海：三聯書店。（原書 Heidegger, M. [1967].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DEU: Max Niemeyer Verlag.）
- 陳蕾（2011）。〈傳播學的身份定位與發展取向——在三種社會科學合法性邏輯的思想張力之間〉，《新聞與傳播研究》，6: 36-45。
- 陳蕾（2012）。〈試論範式概念在傳播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前景〉，《國際新聞界》，11: 39-46。
- 陳蕾（2013）。〈傳播學學科核心範式的演化進路：壹種新的學科史解讀視角〉，《國際新聞界》，7: 70-77。
- 陶鶴山（2002）。〈傳播學的危機與重構〉，《新聞與傳播研究》，2: 31-36。
- 張向東（2007）。《理性生活方式的重建：哈貝馬斯政治哲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孫正聿 (1998)。《哲學通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 梅瓊林 (2005)。〈走向傳播哲學——提供一個傳播學的學科反思視角〉，《人文雜誌》，2: 139-144。
- 郭貴春 (2009)。《當代科學哲學的發展趨勢》。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 郭貴春 (2010)。《科學哲學的新趨勢》。北京：科學出版社。
- 彭運石 (1999)。《走向生命的巔峰——馬斯洛的人本心理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 彭啟福 (2005)。《理解之思——詮釋學初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 全國高校社會科學科研管理研究會組編 (2009)。《跨學科研究與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 雷德鵬 (2011)。《回返人性：論胡塞爾對科學合理性的重建》。北京：人民出版社。
- 趙雅麗 (2011)。〈傳播有什麼意義〉，《中華傳播學刊》，19: 3-24。
- 劉駿洲 (1994)。〈領域的增長與反思——傳播理論的擴張與核心〉，《新聞學研究》，48: 289-291。
- 劉建明 (2000)。〈傳播學研究的稚氣和科技傳播學完善——兼論 21 世紀中國傳播學研究〉，《新聞界》，1: 16-17。
- 劉燁編譯 (2005)。《馬斯洛的智慧：馬斯洛人本哲學解讀》。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
- 魯路譯 (2010)。《哈貝馬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 Detlef, H. [2009]. *Jürgen Habermas*. Darmstadt, DEU: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 歐陽康 (2004)。《哲學研究方法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 潘忠黨 (2008)。〈反思、思維的獨立和研究真問題〉，《新聞大學》，2: 31-33。
- 謝維營 (2009)。《本體論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
- Anderson, J. A. (1996). *Communication theory: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s*.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Budd, R. W., & Ruben, B. D. (Eds.). (1972). *Approaches to human communication*. Rochelle Park, NJ: Hayden.
- Craig, R. T. (1993). Why are there so many communication theor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3), 26-33.
- Goldman, H. (1995). Innovation and change in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Social Epistemology*, 9(3), 211-232.
- Craig, R. T., & Tracy, K. (1995). Grounded practical theory: The case of intellectual discuss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5(3), 248-272.
- Craig, R. T., & Carlone, D. A. (1998).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U.S. higher education: Towards reinterpretation. *Communication*

- Education*, 47(1), 67-81.
- Craig, R. T. (1999). Communication theory as a field. *Communication Theory*, 9(2), 119-161.
- Craig, R. T. (2001). Minding my metamodel, mending Myers. *Communication Theory*, 11(2), 231-240.
- Craig, R. T. (2003). Discursive origins of a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Miami Beach, FL*, 21(11), 12-28.
- Craig, R. T. (2006). A path through the methodological divides. *Keio Communication Review*, 28, 9-17.
- Craig, R. T. (2008). Communica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of disciplines. *Rus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1), 7-23.
- Craig, R. T. (2009). Reflection on "communication theory as a field". *Revue Internationale Communication Social et Publique*, 2, 7-12.
- Cooren, F. (2012). Communication theory at the center: Ventriloquism and the communicative constitution of realit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2, 1-20.
- Dance, F. E. X. (1970). The "concept"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 201-210.
- Dance, F. E. X., & Larson, C. E. (1976). *The functions of communication: A theoretical approach*. New York, NY: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Herbst, S. (2008). Disciplines, intersections, and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8, 603-614.
- Jensen, J. (1993). The consequences of vocabular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67-74.
- Jensen, K. B. (2000). On the edge: A meta-analysis of the state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Nordicom Review*, 21(2), 23-30.
- Jimenez, L. G., & Craig, R. T. (2010). What kind of difference do we want to make?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77(4), 429-431.
- Miller, K. (2007). *Communication theories: Perspectives, processes and contexts (photocopy edition)*. Beijing, CHN: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Myers, D. (2001). A pox on all compromises: Reply to Craig. *Communication Theory*, 11, 218-230.
- Nordenstreng, K. (2004). Ferment in the field: Notes on the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its disciplinary nature. *The Public*, 11(3), 5-18.
- Peters, J. D. (1988). The need for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Reply to Gonzalez.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5, 309-317.
- Rogers, E. M., & Chaffee, S. H. (1993).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y: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125-131.
- Rosengren, K. E. (1993). From field to frog pond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3), 6-17.

- Russill, C. (2007). Communication problems in a pragmatist perspective.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1*, 125-130.
- Swanson, D. I. (1993). Fragmentation, the field, and the futu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3), 163-172.
- Shepherd, G. J. (1993). Building a discipline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3), 83-91.
- Sholle, D. (1995). Resisting disciplines: Repositioning media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y. *Communication Theory, 5*(2), 130-143.
- Streeter, T. (1995). No Respect? Disciplinarity and Media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5*(2), 117-129.
- Sjovaag, H., & Moe, H. (2009). From fermentation to maturity? Reflections o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Todd Gitlin, Jostein Gripsrud & Michael Schuds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 130-139.
- Zhao, Y. (2010).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on communication and China: An introductory and over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 573-583.



# Study on the Problems of Communication Ontology Research and the Path for the Future

Chen Lei \*

## ABSTRACT

Communication Ontology research concerns on the origin, essence, structure, norm, logic, potential, value and consensus of communication knowledge. It's an important and basic proposition which is highly related to the academic practice in pursuit for communication knowledge and the communication scholars' self-realization. Si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 America established the tradition of discussion about communication ontology problem in 1983, thirty years have passed but the fermentation of communication seems to be hard to break through. This paper aims for formulating a project for communication ontology research based on the meta-reflection of the past relevant research and the new exploration of the problems, difficulties, and the possible solutions for macroscopic 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on ontology. More participation and discussion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on ontology has been expected to criticize or polish this communication ontology research project until the grand 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on ontology can lead to consensus among the communication academic community.

---

\* Chen Lei is Lecturer at Communication Colleg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 新聞學研究 • 第一二五期 2015 年 10 月

**Keywords:** Communication, Macroscopic Construction, Metatheory, Ontology,  
Programme